

先锋派是男人的事情

低能儿与好奇心

沙织

节选自提昆 (Tiqqun) 的文章

1

我观察到先锋派的污秽：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在与自己的紧张关系中耗尽自己。丑闻、清洗、盛大的会晤、喧闹的破裂、定向辩论、鼓动运动和分裂是通往结束的道路上的里程碑。先锋派被夹在世界的现状和先锋派必须引导人类走向的最终状态之间，在现实与必然令人窒息的紧张关系中被撕裂，在自身组织的自我戏剧化中受阻，在对投射到大众和历史天空中的自身力量的口头沉思中受困，从未停止失败，先锋派如果不是通过它的每一个运动的始终已经具有历史意义的表现作为中介，就会在自我的无知中转过身来，这种无知吞噬了它。然后，它在出生的这一边崩溃了，甚至还没有到达它应有的开始。关于先锋派这个主题的最坦率的问题——知道先锋派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在那里找到了答案：先锋派首先是追求自我的先锋派。

因此，有一种对“先锋”的先锋派理解，一种与“先锋”本身毫无区别的“先锋”行为。因为它们仍然不过是研究对象所做的研究、所写的文章和圣徒传记，如果没有这一点，人们就无法进行任何解释，尽管它们总是会给人留下二手作品和补充猜测的印象。因为这样一个人在做的只是关于历史的历史，他所论述的东西已经在一种论述中了。

无论谁让自己沉浸在他们的权威传说中，都不会错过与这种俗人接触时所经历的这种迷惑：大众对他们的善行的冷漠程度，这种冷漠的不可理解的性质，以及在这一切之下俗人仍然敢在他们的无知中表现出来的傲慢的快乐。我所说的迷惑并不是分离了两种不同的现实意识，而是分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结构——一种依赖于自身，另一种悬浮在自身背后的无限投射中。从那时起，人们明白先锋是一个主观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现实。

对于这种主体化的制度，没有必要加以具体说明，也没有必要加以表征，所以首先必须把它提取出来；凡是同意这种划分的人，就会使自己失去许多魅力，从而很少长期陷入永久的忧郁之中。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先锋派的光辉和高尚的世界更像是一堆令人讨厌的、皱巴巴的尸体的幽灵般的理想化。因此，那些想要在这个愿景中找到一些令人愉快的东西的人，必须把自己置于一种精心设计的天真之中，不这样就不能驱散这种虚无的紧密阴霾。

4

因此，它的积极模式永远是一种纯粹的偏执狂式的消极，受任何微不足道的赞赏的摆布，受第一个到达的低能儿的好奇心的摆布；比如布尔塞勒家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先锋派经常有一种失败的遭遇，一群摇摇欲坠，不安的人，一群等待着通过这种或那种冲击发现自己缺乏亲和力和，被亲密抛弃的人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先锋派中，唯一的真理时刻是他们解散的时刻。

在宣言中，同样回响着一种希望，一种纯粹的否定可以产生一种决心，一种话语可以奇迹般地创造一个世界。但是先锋派的行动不是很好。没有人能坚持“实践”、“生活”或“社区”，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已经存在了，这只是一个对什么样的实践、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社

区负责的问题；并使自己成为适当技术的承担者来修改这些。但是，在主体化的先锋派制度中，只有存在的东西恰恰是不可假设的。

在这个领域中，**每一个行为的方式都被无休止地权衡、分析和评论，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其他异化的社会关系中滋养着对生存方式的所有唤起的排斥。在那里，在日常生活中，生产的，正常的，只能有纯粹的行为，没有方法，没有任何其他现实，只有原始的结果。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只有那些永远不会回归自我的东西，除了作为产品的标题之外，永远不会出现，除了把它们当作工具的王国之存在的星座之外，什么也没有配置起来。因此，某些行为的“如何”可以成为艺术，必然会导致所有其他行为的“如何”不再是真实的，反之亦然。先锋派艺术家的形象和 O.S. 的形象是现代异化的两极形象，就像幽灵一样相互依存。这个令人不快的问题又回到了他们如何面对自我，因为他们必须同样地保护自己。

决定像先锋派这样的集体事业的失败的内在部分是它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先锋派所有的辉煌，所有的行动，所有的话语都不断地没有给它一个实体；这一切都是在少数人的头脑中发生的，在那里，集体的统一性，即有机的内容，在思想中，也就是说，在思想的外部，得到了发展。共同的纽带，武器，独特的时间性，对日常生活的共同阐述，各种确定的东西都是必要的，这样一个世界才能到来。因此，如果先锋艺术的所有表现形式最终都在博物馆里结束，这是公正的，因为它们在曝光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他们的实验性的自命不凡说明不了别的：事实上，手势、实践和关系的集合——尽管它们可能是越界的——并不能构成一个世界。

在先锋派主体化制度的基础上，历史和历史哲学之间存在着这种混淆，这种混淆允许先锋派把自己当作历史。事实上，一切都像是先锋派为了在自己的时代里庇护自己，做了一项投资，并认为自己在死后得到了历史考虑方面的回报。

博物馆的机构只是局部地实现了世界博物馆化的总体目标。先锋派的所有尝试都同时发生在真实和想象的戏剧中。但是，这种重述同样很好地驱散了先锋派生活在其中的历史主义幻觉，以及它对新颖性、独特性和不可复制的独创性的自命不凡。

2

政治的审美化只是对先锋派美学政治化的一种反应”（鲍里斯·格罗伊斯，《斯大林的全部艺术》）。

如果说先锋艺术有个从来没有失败的口号的话，它就是：走向大众，而不是从自己出发。这与经验的普遍审美化相对应。同样重要的是，先锋派的人，在一生都在大众中寻找大众——至少在他等待他们的地方——之后，把他的晚年献给了对他们的嘲笑。先锋派的人可能是这样一种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以采取旧制度的人的有利姿态，并把他的怨恨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这样，他将永远生活在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纬度下，但总是生活在他自己创造的群众的阴影下。

每一代人似乎都需要产生新的魔术师，他们等待轮到自己表演花招，这样他们就可以让自己相信魔术。但很自然，一代又一代，大江湖骗子的候选人最终只会玷污他们的声誉，每一

季都因为模仿哑剧而让自己蒙上一层新的灰尘和苍白。我和我的朋友们碰巧遇到了这些人，他们在文学市场上以最可笑的先锋派伪装者而著称。说实在的，我们用不着再管这具尸体了，它已经是供幽灵和干尸用的了。在过去的时代，他们发起了一项文学革命宣言；这很明智：他们的大脑——所有先锋派都有大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叫《我的头自由了》。非常糟糕。它以这句话开头：“他们想知道我把身体放在了哪里。”我们说先锋派的问题是头的问题。

随着百年战争的结束，提出了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理论的问题，一个调和公民权利和王室主权的理论。福蒂斯丘勋爵是最早尝试建立这种基础的思想家之一，尤其是在他的《论幸福的角度》中。这篇论文著名的第13章：“这样的人不值得被称为一个团体，因为它是无脑的，也就是说没有头。”因为一个自然的身体在被砍头之后就不再是身体了，而是我们所说的躯干，所以在政体中，一个没有头的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身体。”在福蒂斯丘之后，头就是国王。头部的问题是代表的问题，一个代表社会的身体存在的问题，一个代表社会的主体存在的问题，一个代表社会的主体存在的问题——这里不需要区分存在的代表，因为它是由君主或法西斯领导人执行的，以及“民主”选举的总统的正式代表。因此，先锋派不仅指责再现的艺术危机——拒绝“图像是它所代表的另一个事物的外表，而这个事物却不存在”（托尔克迈达），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事物——先锋派还加速了已建立的政治再现的危机，它以建立对大众的先锋派再现的名义进行了审判。

也许，这些潮流总是会借助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来克服它们的先天缺陷；它将这样代表代表权的离开。毕竟，政治也有权拥有自己的《宫女》。在所有的事情中，它是在它完成的操作中，人们认识到先锋：把它的身体放在远处，面对自己，然后徒劳地试图重新加入它。当先锋派走向大众或屈尊参与他们那个时代的事务时，他们总是首先注意使自己与众不同。1966年，开始有一种他们所谓的“实践”，在工人运动历史性崩溃三十年后，残酷地倾向于工人主义。

我想说的是，那些以粉饰先锋派为职业的人，要对本世纪为数不多的先锋派人士说些什么，这是很奇怪的，但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奇怪的是，这些人在这一点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俄国先锋派的命运上，也就是说，在先锋派的唯一的历史性实现上，却犹豫不决。寓言说，在20年代的一段尴尬的容忍时期之后，布尔什维克变成了可怕的斯大林主义者，**政治先锋派消灭了艺术先锋派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扩散**，并暴政地强加了反动的，倒退的，总结起来就是庸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1914年到1945年，是先锋派的黄金时代，是先锋派作为以不同方式回答头的问题的计划的黄金时代。这个项目将是先锋派艺术家对世界的全面再创造；后来人们更谦虚地称之为“艺术的实现”。它将以一种更加神秘的方式，被俄罗斯先锋派的连续潮流所显著地发扬，从左翼阵线到反左翼运动，从至上主义到生产主义，再到建构主义。因此，这是一个彻底改变生存条件的问题，是建立一种新的人类，即马列维奇所说的“空白的人类”的问题。但是，**先锋艺术被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从而与过去的关系所束缚，无法实现这一计划**。像摩西一样，它可以承载它的梦想，但不能实现它。“新生活的建筑师”，“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的角色再也没有回到它身上，正是因为它与古代艺术相关联，即使是被拒绝了。它的计划只有党才能实现，先锋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宣传，那就是它要付诸行动，它要利用它，它要使它为新社会的建设服务。马雅可夫斯基毫无恶意地要求“笔要像刺刀一样被同化，作家要能够像其他任何苏维埃企业一样，在筹集‘一百卷党卡’时与党保持平衡”。

这里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因为1932年4月23日宣布解散所有艺术团体的决议受到了很大一部分俄国先锋派的欢迎。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是以“改造一切生命”为口号，提出了先锋艺术的最高美学计划吗？同意镇压并因此承认先锋派的活动和审美偏差是政治性的，难道不是认可了集体艺术家的作用吗？对集体艺术家来说……人们最常解释为对先锋派的专制的清算，更确切地说其实是它的自杀，而不是它的纲领实现的首次亮相……没有了身体，就会凭空地自己形成一个新的领袖。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人们假装看到了民俗形象的回归，艺术问题上的古典主义，正如格罗伊斯更普遍地观察到的那样，“斯大林主义文化，如果我们从先锋派对自身的理论反思的角度来考虑，似乎更像是它的激进化和形式上的超越”。对古典元素的使用，被先锋派所谴责，这只是标志着这种主权的超越，标志着后历史时代的巨大飞跃，在这种飞跃中，过去的所有美学元素都可以同样地被借用，并利用起来，在一种功利的突发奇想中，发现一个全新的社会，和过去的历史没有联系，也没有对它的仇恨。所有后先锋主义永远不会放弃这种活尸式的观点，这种彻底改造世界的计划；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同时与它所处的时代同时，又被一种必要的审美距离所分隔。对于那些踌躇满志的先锋派来说，这无疑是一件越来越滑稽的事情。

3

毫无疑问，未来主义对当代前卫艺术的定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因此，在先锋派不再只是被嘲笑或怀旧的对象的时候，重新开始演讲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把我们的最初愿望告诉了地球上所有的人……诗歌必须是对未知力量的猛烈攻击，召唤它们向人类低头。我们正处在几个世纪的极端海角！在我们必须打破不可能的神秘之窗的时刻，在我们身后有什么好处呢？时间和空间昨天都死了。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中，因为我们创造了永恒无所不在的速度。我们想美化战争——世界唯一的卫生——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性行为、杀戮的美丽思想和对妇女的蔑视……我们要歌颂为工作、享乐或反抗而激动的广大群众。”这里不是讽刺的问题，更不是道德的问题，而仅仅是理解的问题。作为一种类型，先锋派是作为对世界可居住性的男性反应而诞生的，因此帝国机器已经开始发展，作为重新占有自主技术的非世界的愿望。

先锋派的诞生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一种反应：在普遍的商品等价中，所有的决心都变得荒谬可笑——因为改造世界、改变生活的只有商品。对于景观中无法忍受的人类边缘性，先锋派以宣告回应，以宣告自我为中心；除此之外，这个宣言只是虚幻地废除了它的次要性质。由此产生了疯狂的竞争，长期过时的综合症，以及对微小差异的悲喜剧恋物癖，这种恋物癖激起

了先锋派的小小世界，最终也提供了一种像地铁里最后一班火车上流浪汉们可怕的打斗一样痛苦的景象。先锋派本质上是男人的事情，这一点必须与之密切相关。先锋派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它是前进中的退却，是古典男子气概在危险中被迫走向最后的盲目，走向对自我的无知，这种无知比西方男性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知更为复杂。他需要通过一种表现来调解他与自我的关系——他在政治史或艺术史上的地位，在“革命运动”中，或者更普遍地在先锋团体本身中——只对应于先锋人物在确定性中生活的无能，对应于他真正的无宇宙主义。

在他空洞的自我肯定中，个人的独创性的事业有利于取代他自嘲的独特性的假设。通过奇点，我在这里理解了一种存在，它不仅关注空间和时间，还关注一个有意义的星座和它内心发生的事情。这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奇点找不到任何地方来获得它的适当确定性，找到它的身体，因为先锋派假装对生命进行最精确、最权威的描述，也就是说，荒谬地打击它的名字的奇点——因此，在集体自我说服的管理假设之外还要问：每个人头脑中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任何人？我们如何成为绝大多数压倒性思想的代表？众所周知，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钦佩地容纳了黑格尔主义，黑格尔主义只是一种傲慢的表达，它不适合假设自己正常性质的独特性——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最恰当地记得精神现象学的开始，它的创始姿态，一个单臂杂耍者的真正伎俩，就是取消确定性：“因此，普遍性实际上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既然我说的是我，这个单独的我，我就泛指所有的我。”

“先锋派”从来没有指定一种确定的积极性，而总是指定一种假装的积极性的事实：首先，在否定中持久地维持自己，其次，赋予自己自己的否定性，“激进性”，自己的革命本质。这样一来，先锋派就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敌人，尽管它在这个或那个方面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敌意；先锋派只是宣称自己是这个或那个的敌人。这就是它在自身背后运作的投影，以赢得它在表征系统中为自己打算的位置。因此，先锋派自然开始使自己幽灵化，也就是说，表现出自己的所有方面，从而阻止敌人这样做。

5

1980年，一本关于20世纪下半叶先锋派的最软弱的书《先锋派的自动解散》获得了认证。作者勒内·卢罗是完全可笑的“制度分析”的创始人，不用说，他省略了最重要的内容：即先锋派是在什么情况下解散的。西方神经症的最新进展早已得到证实：先锋派被溶解在社会关系的整体中。从此以后，将我们的时代平庸地描述为“后现代”，没有别的含义，即使它只是另一种清除现代性所有修饰以拯救基本行为的方式：超越——在这一点上，甚至“后现代主义”一词在1934年首次出现在西班牙先锋派的圈子里，也不是偶然的。同样，德博德给景观的最佳定义——“一种以图像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今天定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只注意到先锋派存在模式的概括。因此，对一个大众式的人来说，一切关系，无论是与自己的关系，还是与他人的关系，都完全以自主的表象为中介。是野心家组织了自己永久的自我提升，是愤世嫉俗者随时威胁要让自己被他们的一个话语赘肉所吸引，或者消失在深海讽

刺的深渊中。先锋派的偏执狂也被驱散了，以这种驱散的方式，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把自己当作例外；带着这种一般的倾向，建立起自己的个人遥控小传奇——

阿塞法勒 (Acephale)，无领袖的群体的象征，指出了群氓的一个极端。Acephale 倾向于将自己从头部问题中解放出来。与超现实主义相比，阿塞法勒几乎完全是男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阿塞法尔不知道怎样从头部经过，怎样从一端到另一端不成为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团体，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写家谱，那份使阿塞法尔诞生的“内部日记”，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规定了这个会的仪式，他一个人完成了，恳求他脸色苍白的同伴们在他那受惊的树下献祭：“太美了。但我们都有一种参与巴塔耶的情绪，在巴塔耶的头脑中。”(罗梭斯基)。

必须顺便说一句：这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身体和行动的瘫痪。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沙织

先锋派是男人的事情

低能儿与好奇心

<https://mp.weixin.qq.com/s/bMObEpY5r5iGwN2YVugTFQ>

nightfall.buzz